

胡适经典论丛

Hu Shi Jingdian Luncong

# 胡适

论

历

史

李传玺一选编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比从

论  
历史

李传玺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论历史 / 胡适著 ; 李传玺编选.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8

(胡适经典论丛)

ISBN 978-7-5336-7662-9

I. ①胡… II. ①胡…②李…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392 号

书名: 胡适论历史

作者: 胡适

HU SHI LUN LI SHI

出版人: 郑可

责任编辑: 王骏

责任印制: 何惠菊

装帧设计: 许海波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63683008,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551) 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22.75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662-9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关于胡适,最大悬疑就是老先生的博士学位问题。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无中生有,是1920年左右梅光迪先生挑起的,由此看来,这应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先生酝酿文学改良和任叔永、梅光迪等先生论争留下的“隐患”。但不管怎么争论,关于他的学位论文却不可能存疑,那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印行中文版时译名为《先秦名学史》)。从这个名称,稍加一想,即不难看出,不管我们后来给胡适加多少个头衔,胡适是从中国历史起步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史哲不分,这个“史”还是构成了胡适学问的根基,胡适首先是个“历史学家”。

还是从这本书说起,最早“版本”中最早的论述可能最为符合作者的本意。通过回顾九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胡适深感不仅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影响制约,而且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发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新中国必须正视的、更大的、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然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

发展”？“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胡适认为“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充分地发展科学的方法，用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看真理和道德”，“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上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更重要的还是我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都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例如，为什么古代中国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进化理论没有获致革命的效果，而达尔文的理论却产生了现代的思想。进一步地说，我希望这样一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避免因不经批判地输入欧洲哲学而带来的许多重大错误”。从此可以看出胡适历史观的基点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也不是学术教条主义的食洋不化，更不是高蹈主义的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本着批判的精神、借鉴的态度，充分运用西方现代哲学的新方法与新工具，全面发掘本民族传统哲学的精粹与方法，深刻思考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且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在近现代却不能产生科学革命。胡适希望，通过一代或几代学人的努力，可以使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实现对接，并在两者一致、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与哲学，不仅使我们的研究者面对西方文化恢复自信，而且通过我们的研究来避免西方的错误并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科学与文化的复兴。

什么是胡适历史观中的历史的或发展的观念？胡适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种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因此，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考察一个学说，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与他所受的学术影响，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把握了前两者，就可以知道其时代来历与理论来历，把握住了后者，就能明白其价值与功用。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这种方法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宗，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认为这种观点，由于回到社会和个人历史情境中去分析，所以最忠厚宽恕，由于处处用他所发生的效果来对其作出评判，所以最严厉公正。正是从这个根本的历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他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他的白话文主张：文学家，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也不必摹仿周秦，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这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为此断言，今日之世，白话文学必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虽然胡适的历史观有很强的杜威色彩，但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也作了中肯分析与高度评价。一切放到历史的情境中来进行分析具体研判，一切放到历史的实践中来具体检验具体衡量，这使得胡适的历史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承续性与科学性。

什么是胡适历史观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科学精神就是“拿

证据来”，这四个字比寻求真理来得实在且通俗且简明，“消极方面的说法，就是‘无征则不信’，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充分证据，我们就不信。积极方面的说法，就是要拿出证据来，要跟着证据走，不论他带我们到什么危险可怕的地方，我们也要去”。具体到历史学的研究中，就是要求我们的历史学家都要本着敬慎的精神，带着如同法官断案一样的责任心，给自己建立两个驳问的标准：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这个证据足够证明那一点么？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科学，一类是实验科学……无论对历史科学也好，对实验科学也好，总之，第一步必须要提出问题，第二步把问题的中心和重点指出，第三步去假设，第四步用演绎的方法把假设某种结果推想出来，第五步去找证据或从实验中来证实它，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具体到证实的过程，胡适要求我们注意三件事：“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可以“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可以“稍稍限制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这个求证的过程就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只有这样被证实的理论与思想才能算作真理。

无论为人为文，胡适终其一生都在不移地践行着自己确立的这个主张。他曾经这样自我评价和教导别人，“我平生留意方法

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我中年以来,常用勤、谨、和、缓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了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胡适的历史观及其提出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声,推动了中国学术从清学的传统界域向现代领域的革命性转折。无怪当他将《先秦名学史》扩展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蔡元培先生激动地评价:替中国学术开了无数门径;无怪20世纪50年代年代大陆批判他时,一位著名学者无奈地说,这是在用胡适的方法胡适的事例胡适的理论来批胡适,能批倒么?无怪胡适自己说,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思想的一次大普及。今天看来,胡适要再造文明的良苦用心,不仅值得我们景仰,也值得我们深思。胡适倡导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也仍然在警醒着我们。

《胡适全集》中有一篇文章是《胡适所推选之十大历史名人》。此文中胡适的叙述可为编选本书的参考线索。“1957年三月七日,严文郁至美国康乃尔大学纽约医院探望正在那里养病的胡适时,向胡适提问:‘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十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你将推荐何人?’胡适想了一会说:‘我的排行榜是:(一)孔子;(二)老子;(三)墨子;(四)韩愈;(五)杜甫;(六)范仲淹;(七)王安石;(八)朱熹;(九)王守仁;(十)顾炎武。若是再加几名,则可列上:孟子,司马迁,王充和张居正。孟子是儒家代表,朱元璋晚年谈《孟子》一书,颇为惧怕,令人删去三分之一,因其对君主不利。王充为大思想家,值得推崇。张居正为明代名相,有功于世。’”

由于胡适史学论著面比较宽,我在尽可能不选太长文章的前



提下,主要编选了能够代表胡适思想、能够体现胡适史学方法论的总括性的文章,适当编选了一些可读性强的文史小品;有些文章看似与史学无关,但恰恰是这些文章能够让人从一个侧面看到胡适史学思想的来源和其对历史发展的准确预判。

李传玺

2013年5月

# 目 录

前 言	李传玺(1)
中国思想史纲要	(1)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8)
《吴淞月刊》发刊词	(13)
《文史》的引子	(15)
说史	(17)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	(23)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41)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53)
搜集史料重于修史	(63)
历史科学的方法	(67)
春秋战国时代哲人思想的勃兴	(70)
老子	(76)
说儒(五、六)	(94)
道家	(125)

## 论墨学

- 我的第二书 ..... (142)
- 所谓法家 ..... (145)
- 读《吕氏春秋》 ..... (163)
- 汉初儒道之争 ..... (189)
- 两汉魏晋的思想趋势 ..... (193)
- 董仲舒与司马迁
- 干涉论与放任论 ..... (197)
- 王莽
- 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 (204)
- 王充的哲学 ..... (212)
- 曹操创立的“校事制” ..... (222)
- 曹魏外官的“任子”制 ..... (226)
- 读《北史》杂记 ..... (228)
- 氏族之门不与王侯婚 ..... (236)
- 《白话文学史》引子 ..... (238)
- 《词选》自序 ..... (243)
- 词的起原 ..... (249)
- 书院制史略 ..... (262)
- 记李觏的学说 ..... (268)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 (288)
- 王荆公的有为主义 ..... (294)
- 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 ..... (296)
- 《西洋现代史》序 ..... (304)
- 考作象棋的年代 ..... (306)

论《春秋》答钱玄同 .....	(308)
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 .....	(311)
答关仲豪(1941年3月31日) .....	(316)
致傅斯年(1942年5月17日) .....	(318)
中国教育史料	
——与陈世棻书 .....	(320)
中国人思想中的不朽观念 .....	(323)
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运动 .....	(345)

## 中国思想史纲要\*

为了方便起见,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耶稣纪元前的一千年为上古时期。伟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时代,以及一直通过了纪元后一千年的全部时间,都为中古时期。而近世这一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

中国思想史的上古时期,可说是古典时代。从那时传下了一些前于孔子的古典作品,诗歌的,历史的,关于行为轨范的,关于宗教崇拜的;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哲学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翟,一直到孟子、庄子及韩非——这可称之为中国学术的《旧约全书》时代。这个上古时期,不独为所有后来各时代的中国思想

---

\* 本篇原系英文,题为 *Chinese Thought* (《中国思想》),1942年10月刊于《亚洲杂志》42卷10期(*Asia Magazine*, Vol. 42, No. 10, October, PP. 582~584.)又收入麦克雷尔所编的《中国》一书,加利福尼亚大学1946年出版(*China*, ed. by Harley F. MacNa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PP. 221~230.)1943年2月由冷观译成中文,改题为《中国思想史纲要》,刊于1943年2月16日重庆出版之《读者通讯》半月刊第60期。  
——编者

史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国中古及近世思想家们,可以用来作凭藉,去为哲学及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工作。简单说来,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是为了它始终而且明显的注意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社会。举例说来,当孔子被人问应当如何事鬼神时,他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被问关于死的意见时,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于人生的执着,就成了一个特点,使中国古代思想与印度、波斯,甚至伊色利(Israel)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国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家、教育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古代中国曾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又产生了许多关于人性,关于道德行为,关于法律及政治组织的种种成熟的学说,但对含有“乐园”意义的“天堂”,看作“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狱”,则一无所知,并且对于生死问题,也从来没有耽于玄思默想过。

其次,中国古典思想之所以成为合理,成为唯理智主义的原因,是由于他对于智识、学问和思想的重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中国思想的派别很多,从孔子的明显的唯理智主义的态度(孔子曾明白承认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确的、唯理智主义者的(Rationalistic),但几乎是反理智主义者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态度。老子这么吟咏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在这两极端之间,可以寻到那时中国思想上一些其他的伟大学派。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对那比较吃力的学习及研究过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这一类的差别,在两种不同的性情之间,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别。这两种性情,威廉詹姆斯氏曾把一个称之

为“软心肠的性情”，把另一个称之为“硬心肠的性情”。中国思想从未诉之于超自然或神秘的事物，以作为思想或推理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一般说来，中国思想是始终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统学派，对于知识和考察，都十分重视。再从这一方面看，它确是偏重于唯理主义者的态度。

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与合理及唯理主义者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就给予古代中国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且对于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国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讲到他自己时，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道德与理智力量仅次于孔子的孟子，也曾经更有力的表示过这个自由的精神。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时代对于理智生活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个时代多样的理论、社会及政治作品，现在读起来，还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

这里就是孔子和他自己国家统治者的谈话：

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善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从这样一个人道的、合理的、客气的，然而在精神上又是这么坚定的，这么自由的回答里，我们可以了解二十五个世纪以来，孔子对于中国人的控制力量的所自来了。

下面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问答：

“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孟子问。

“无以异也。”梁惠王答。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王曰：“无以异也。”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下面又是孟子告诉齐宣王的一段话：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从这类的讨论中，我们不禁要觉察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使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他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



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

虽然当中曾经有过一千年的时光，一般人都集体改信佛教，也还并没有能根除这个遗产。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好像中国的合理性及人文主义，已经被一个中古时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没了。这个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统治下所产生的。成千成万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当和尚和尼姑。宗教热就像浪潮一样的冲进了中国。作为对于佛教神圣献祭的最高形式，一个虔诚的和尚，可以欣然烧掉一个手指，一条膀臂，或者甚至他的整个身体。上千万的信男信女，有时甚至是宫廷中的人物、也都蜂拥到山上去，目击而且悲泣一个高僧的自焚。

正是为了这样的出世态度，和这样非人道的狂热，才又把中国震动得恢复了知觉，恢复了理性，恢复了人性。在历史上那几次政府迫害佛教举动的背后，永远的有中国文明对于要使中国“蛮化”的这潮流的一种反抗态度存在着。

举例来说，公元八四五年对佛教大迫害时，上谕里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政府不能把中国人民弃之于对一个外国舍生宗教的崇奉了。”这就是中国人道主义对于使中国思想文明印度化的一个革命。

中国反抗佛教的最大代表，及大声疾呼得最厉害的领袖是韩愈。他指出过，中国思想的最高理想，是说一切的个人道德及理智培养，必须有一个社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一切志在由苦行及逃世以自救的个人教育，都是反社会的，因之也是非中国的。

韩愈为这个反抗提出了著名的冲锋呐喊，所谓：“人其人！”那就是说，使和尚尼姑们一律恢复人性和人的生活！他对于佛教的